

于淑健 著

敦煌佛典語詞和俗字研究

——以敦煌古佚和疑偽經爲中心



古代漢語學研究系列

黃征 主編

于淑健 著

敦煌佛典語詞和俗字研究

——以敦煌古佚和疑偽經爲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敦煌佛典語詞和俗字研究 / 于淑健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4

(語言科技文庫 · 古代漢語學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5325 - 6219 - 0

I . ①敦… II . ①于… III . ①敦煌學—佛經—詞彙—
研究②敦煌學—佛經—異體字—研究 IV . ①
K870. 6②B9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2) 第 010383 號

語言科技文庫 · 古代漢語學研究系列

敦煌佛典語詞和俗字研究

于淑健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635 × 965 1/16 印張 27.5 插頁 2 字數 382,000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5 - 6219 - 0

H·71 定價: 65.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承印公司調換

《語言科技文庫》總序

李葆嘉

當代語言學已經進入了一個科學與技術的互補時代，信息處理水準成為衡量國家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誌之一。知識世界的載體是語言符號系統，信息處理的根本物件是語言信息處理。與計算機的出現使得語言符號有可能成為數據處理對象相似，神經科學實驗儀器設備的應用，使得在大腦神經層面探討語言機制成為可能。這些無疑都引導語言研究走向科技化，“語言科技新思維”（李葆嘉 2001）應運而生。

所謂“語言科學”包括理論語言學、描寫語言學、歷史語言學、應用語言學等分支學科，所謂“語言技術”指語言研究的現代技術手段，包括語言信息處理、語音實驗分析，以及語言的神經、心理和行為實驗分析的技術手段等。就語言信息處理而言，又可以分為語料庫研製技術、知識庫研製技術、知識挖掘和抽取技術、句法信息處理技術、辭彙信息處理技術、語音信息處理技術、語義信息處理技術、語用信息處理技術等。

2001年5月，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創辦了史無前例的“語言科學及技術系”，率先邁出了從傳統文科教育範型向現代科技教育範型轉變的步伐。“十五”期間，南京師大“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語言信息處理與分領域語言研究的現代化”（陳小荷教授主持），以基礎平臺建設、資源建設和理論探索等為主，邁出了語言科技研究的一大步。

“十一五”期間，南京師大文學院、外國語學院和國際文化教育學院連袂申報“211工程”三期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該項目以“語言科技”為引導，以“多學科交叉、跨院系整合、開放型營運”為理念，建設具有前瞻性、原創性、成長性的語言科技高級工作平臺。以典型課題的工作原理為核心，進行資源開發和系統研製，拓展語音科技、二語習得的神經機制研

究、語言能力受損兒童的語言能力研究等新方向。同時造就新一代學術領軍人物和培養一批高層次複合型人才，以期形成一支高水準的交叉學科團隊。該項目設計，體現了工作平臺建設、理論創新、應用研究、人才培養、團隊建設的學科發展一體化思路。其旨趣在於，加速語言研究從傳統文科範型向現代科技範型的轉變，以引領21世紀語言科技的新潮流。

作為新興交叉學科項目，通過教育部組織的專家匿名評審，“語言科技創新及工作平臺建設”（2008—2011）獲批，總投入1 000萬元。總體而言，這一“語言科技創新”團隊，分支學科齊全、專業知識互補，涵蓋了理論語言學、計算語言學、語義科技、語音科技、實驗方言學、歷史語言學、神經語言學、二語習得研究、話語行為語言學等領域。這一期間，項目組成員獲批的國家級基金項目達20多項。該項目理念之前瞻、實力之雄厚、工程之浩大、經費之保障，為學界矚目。

2008年秋，本項目以南京師範大學語言科技研究所為實施單位正式啓動。主要有三大任務：建設一個“整體性、科技型、開放型”的語言信息科技實驗室，研製一個具有“獨創性、交叉性、應用性”的語言科技工作平臺；出版一套“大視野、跨學科、新思路”的語言科技文庫。

從實驗室方案設計到設備招標採購，再到實驗室用房改造，經過8個月的努力，2009年12月，語言信息科技實驗室建成，為語言研究從傳統範型向科技範型的轉變提供了基本保障。該實驗室劃分為實驗工作區、科研工作區和管理服務區。實驗工作區建有語音實驗與計算室、神經認知實驗與計算室、課堂話語實錄室三個專門實驗室。科研工作區建有語義科技工作室、語音科技工作室、方言實驗工作室、知識工程工作室I（先秦辭彙）、知識工程工作室II（中古辭彙）、知識工程工作室III（敦煌俗語言文字）、語言（英）習得神經機制工作室、語言（漢）習得中介機制工作室，以及參研工作室。管理區服務包括辦公室、管理室、編輯室和交流室。出席“語言科技高層論壇暨語言信息科技實驗室落成儀式”（2009年12月14日）的專家認為，該實驗室體現了語言學跨學科研究的當代性和先進性，具有整體性、科技型、開放型三個特點，處於全國領先地位，是“語言

科技新思維”的又一體現。同時認為，該實驗室的科研工作涵蓋了四個二級學科、四個博士學位點，有穩定明確的研究方向，有合理的設計規劃和很好的科研基礎；整體設計合理，功能齊備，以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建設標準衡量，很多方面超過了指標。

語言科技工作平臺是基於工作原理（課題定位—理論方法—技術路綫—關鍵技術—評估方式）而建設的高級平臺。一方面，從語言信息、語言知識和語言機制三個層面，圍繞典型課題進行設備配置、資源建設和軟件開展；一方面，將典型課題研究與工作平臺建設融為一體，依據典型課題建設的子平臺應具有解決同類課題的功能。

建設語言科技工作平臺的目標是要實現語言研究手段的技術化和模型化，總體設計包括三個二級平臺和八個子系統。

一、語言信息工作平臺。1. 語義科技工作系統（李葆嘉教授主持）：基於辭彙語義—句法語義的一體化研究思路，開發“人—機交互語義標注工具”，研製“深度語義標注信息庫”；研製“幼兒（2—6歲）日常話語跟蹤語料庫”，完成幼兒語義系統和話語行為分析研究。2. 語音科技工作系統（顧文濤教授主持）：研製“多語言、多語境、多語用的語音語料庫”，基於聲學信號分析、感知實驗和數學建模，完善語音韻律理論與相關技術應用。3. 方言實驗工作系統（劉俐李教授主持）：完成“網絡版漢語方言有聲語料數據庫”，擬定系統的可操作性語音、辭彙、語法實驗模型和研究方法，進一步完善新興交叉學科“實驗方言學”。

二、語言知識工作平臺。1. 先秦辭彙統計與知識檢索系統（陳小荷教授主持）：研製“先秦文獻語料庫”、“專名知識庫”、“漢語辭彙檔案庫”等，開發先秦文獻自動分詞演算法、古籍版本異文自動發現演算法、同指專名檢索軟件工具等，完成“先秦漢語辭彙統計與知識檢索”。2. 中古辭彙統計與知識檢索系統（董志翹教授主持）：研製“中古文獻語料庫”、“專名知識庫”、“中古漢語辭彙檔案庫”等，開發中古文獻自動分詞和標注工具等，完成“中古漢語辭彙統計與知識檢索”。3. 敦煌俗語言文字知識檢索系統（黃征教授主持）：研製“敦煌文獻資料庫”、“敦煌文獻

俗詞語檔案庫”，開發相應工具，完成“敦煌文獻資料與知識檢索”。

三、語言機制工作平臺。1. 二語(英)習得的神經機制研究系統(倪傳斌教授主持): 研製“英語受蝕辭彙庫”等, 基於行為學、腦成像和腦電三維度模型, 進行中國人英語習得與磨蝕的神經機制研究, 完成“基於神經機制的英語個性化學習分析系統”。2. 二語(漢)習得的中介機制研究系統(肖奚強教授主持): 研製“留學生漢語口語中介語語料庫”, 基於中介語理論、對比分析理論、偏誤分析理論以及二語習得影響因素等, 完成“留學生漢語習得的中介機制研究”。

這一工作平臺, 既是科技研究平臺, 也是人才培養平臺, 即一個現代化的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體系。

作為本項目的文本成果,《語言科技文庫》包括計算語言學研究、語義語法學研究、漢語方言學研究、古代漢語學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語言新專題研究六個系列。其總體特徵為: 領域的開拓性、理論的原創性、選題的新穎性、方法的交叉性、考據的精審性、成果的應用性。在研究過程中,除了資料獲取分析、資源建設和軟件開發,更重要的還是要有新思路、新理論和新材料。陳小荷提出的先秦文獻信息處理新方法,從先秦典籍注疏文獻中挖掘出用於自動分詞和詞義消歧的知識,再注入已開發的古漢語分詞和詞性標注工具中去,所取得的先秦古籍版本異文自動發現、先秦辭彙知識自動挖掘等成果均具開拓性。李葆嘉提出的語義語法學理論和話語行為理論,基於研製專用語料庫或語義信息庫和技術手段,開拓了語義網路建構、深度語義分析和話語行為研究等新的領域。劉俐李建構的實驗方言學理論和方法,為方言學向現代科技方法的轉型研究提供了新路,並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黃征多年來從事敦煌文獻及其俗詞語文字研究,古代漢語學研究系列中的敦煌文獻校錄整理,以及敦煌寫本字詞考釋、以古佚和疑偽經為中心的敦煌佛典詞語和俗字研究、兩漢聲母系統研究等新見迭出。肖奚強基於漢語中介語語料庫的二語習得研究,在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界已經產生了影響。錢玉蓮等的漢語介詞與相應英語形式比較研究等專著,各有亮色。倪傳斌依據語言測試和認知實驗等資料,

從行為學、生理學和語言學三個層面分析影響中國英語學習者外語磨蝕的相關因素。劉宇紅基於隱喻的理論探討，對各類隱喻形式的結構、特性和解讀規律進行了多視角的深入探討。

《語言科技文庫》所收論著，由作者在2008年12月申報選題，2011年始逐步完稿。該系列叢書的主編審讀了部分書稿，主要就其學術價值、章節安排、內容關聯、行文表述、圖表繪製等方面，提出審閱意見。此後，作者們對書稿又進行了修改和潤色。《語言科技文庫》的作者，大多數是具有博士學位的年輕教師。對於我們這些20世紀80年代走進語言學研究領域的前行者而言，出版論著可能已不足為道。然而，對於年輕學者而言，其論著的出版既是幾年來研究的結晶，也是對其繼續探索的促進。換言之，“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的目的之一，就是為年輕教師搭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科研和教學平臺。學科帶頭人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提攜後進。

儘管從根本上來說，科學或學術研究是一種個人的探索行為，然而複雜問題的研究，無疑需要群體協作。“學科建設”或團隊合作模式，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出現的一個新概念。這種模式涉及總體規劃、多方協調，是需要付出精力和心血的。2008年，通過投票方式，我被推舉擔任該項目總負責時，就意識到自己成了一個“勞動班委”。2009年，前往安徽大學拜訪黃德寬教授時，我曾談到“學科負責人的任務就是規劃設計，爭取項目經費和提供科研設備設施”，得到黃教授的贊許。2010年，申報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時，評審專家柳士鎮教授提問的“作為一個交叉學科項目，各學科之間的協調是怎麼考慮的，有什麼做法”，可謂一語中的。作為後學，深知交叉研究之艱、學科整合之難。相關學科之間的整合協調需要借助行政機制，但憑藉行政方式並非就能完成。當時的回答是，目前做到的是建成了一個可以合作研究的場所，至於學科之間的進一步溝通合作應有較長過程。有一點很明確，只有通過交叉項目，相應學科纔能滲透，合作者纔能逐步磨合。我們只是在一步步探索。

十一五期間的“211工程”建設項目即將完成,但是學科建設的任務並沒有結束。2010年,“語言信息科技研究中心”被評審為江蘇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為“語言科技”這一交叉領域注入了新的建設活力。重點研究基地建設,除了“跨院系整合、多學科交叉、開放型運行”理念,需要凸顯“合作性攻關”。圍繞交叉性項目,實施計算語言學、語音科技、神經語言學、語義科技等力量的聯合攻關計畫。只有通過全面開放,以及和與國內外同行的合作交流,纔有望建成具有影響的語言科技研究、人才培養和學術交流基地。

十年前(2001年),我曾寫道,“語言科技”的內涵是以理論研究為指導,以描寫研究為基礎,以應用研究為樞紐,促使語言研究向計算機應用、認知科學和現代教育技術領域等延伸,溝通文理工相關學科以實現語言研究過程及其成果的技術化。“語言科技”的外延為語言工程科技、語言教育科技和語言研究科技。其中,“語言研究科技”是將語言研究活動與資源建設、軟件開發相結合,其目標是實現語言學自身的科技化。還應包含語言實驗、數據處理這些實驗語音學、神經語言學研究的科技手段。

雖然語言學家不可能也不必要都轉向語言計算或實驗研究,儘管描寫、考據和內省始終是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具有一定的語言科技意識卻非常必要。語言學家只有了解有哪些可供利用的資源、軟件或儀器,纔能提高其研究深度、精度和效率。語言學家也只有了解到信息處理的語言研究需求,纔有可能為之提供可資應用或參考的基礎成果。“語言科技”是21世紀語言學研究的潮流。

此為出版緣起。是為總序。

2011年8月謹識於南都

序

于淑健從2000年起隨我讀研，前後六年，一直做着同一個專題——《大正大藏經》第八十五卷（又稱“敦煌卷”）的校勘整理。這是我建議做的一個題目，我希望他能夠在此目標文獻基礎上完成學位論文，同時與我合作完成全卷的點校，將來一起署名出本書。他完成了他的兩個學位論文，也完成了點校工作的大部分，成績非常顯著。

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後，于淑健希望再做個博士後研究，於是我嘗試推薦給我的師兄張涌泉教授，張師兄欣然接受了他。從那之後，于淑健的學習與研究更加接近“浙派”的特點。什麼是訓詁學、漢語史研究上的“浙派”？我覺得歷代漢語史料中的俗字、俗音、俗語詞的考釋研究，就是訓詁學、漢語史研究上“浙派”的典型特點。雖然身在浙江或出自浙江的訓詁學、漢語史研究方面的專家學者，也有不少其他方面的研究，而且也成果不少，但是要放在全國範圍來看，要能顯示自己的特色，那麼我敢說浙江學者在俗字、俗音、俗語詞研究方面的特色是最鮮明的。《詩詞曲語辭匯釋》的作者張相先生就是浙江杭州人，《世說新語校箋》的作者徐震堉先生是浙江嘉善人，我的導師蔣禮鴻雲從先生是浙江嘉興人；我的導師郭在貽先生雖是山東鄒縣人氏，但是求學浙江，主要受蔣先生影響，不僅考釋出一大批高難度的疑難字詞，還大大開拓了訓詁學的研究領域，在《訓詁學》一書中首次系統闡述俗語詞研究的性質、意義、態度和方法，列舉大量乾嘉學派成功的例證，和自己獨到的考釋成果，從而奠定漢語俗語言學研究的理論基礎，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專業人才。

然而，在諸位大師紛紛下世之後，俗字、俗音、俗語詞的考釋，一度被認為是“揀了芝麻丟了西瓜”，沒有抓住漢語史研究的關鍵，於是俗字、俗音、俗語詞之類的個體考釋漸漸冷落，許多學者不再追求訓詁學研究

的“高精尖”，轉而描述漢語史詞彙的一般使用情況，以至於近二十年來碩士學位論文、博士學位論文以及博士後出站報告都很少專做疑難字詞考證的。要有，也幾乎是搜羅前人成果，略加述說，便成條目，沒有多少真正屬於自己的考證。有的沒有多少真知灼見，卻又想標新立異，於是挖空心思來與前人“商榷”。更有甚者，抄撮前人研究成果，不標出處，號稱己出，被導師發現了還不願意刪除。凡此種種，既反映了現在的研究生功力往往欠佳，也反映了一些研究生導師自己缺乏這方面的鑽研，難以傳授真學。要想“金針度人”，首先得自己有真貨，繡花枕頭傳授給學生的恐怕也只能是繡花枕頭。記得郭在貽先生在世時經常說的一句話是：看一個人的訓詁成就是高還是低，主要看他考釋出多少個疑難字詞，而不是看他有沒有寫過一部《訓詁學概論》之類的書。這是我永遠銘記在心的警示語。雖然我們不反對理論研究，而且也在寫這方面的著作，但是我們都是要在做過一批俗字、俗音、俗語詞考釋之後再去寫，是在實踐基礎上做理論總結，而不是空對空發高論。

于淑健的這部著作，其主體是在張涌泉教授指導下完成的博士後出站報告，上編理論，下編考釋，考釋是理論的基礎，理論是考釋的概括。而在考釋部分，非常突出的就是兩類：俗字、俗語詞。所以這是“浙派”訓詁學研究的核心、重心，于淑健可謂得其要矣。書成，于淑健索序於余，我回說應請張涌泉教授作序，畢竟書稿是以他指導的出站報告為主寫成的。然而，據說張師兄不願意打破不為自己學生作序的慣例而謝絕了。不得已，我囉嗦幾句，勉為之序，希望不至於打消讀者讀書的興致。

江浙散人黃征



2012年1月21日寫於金陵石頭城下

凡 例

一、本書所謂“敦煌佛典”指20世紀初在敦煌藏經洞面世的近六萬件遺書中所有漢文佛教典籍，包括正藏、別藏、天台教典、毗尼藏、禪藏、宣教通俗文書、敦煌寺院文書、疑偽經等，而以敦煌古佚和疑偽經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二、文中所引敦煌文獻，除特別注明外，一般據《敦煌寶藏》、《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俄藏敦煌文獻》、《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簡稱“中村不折”）、《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簡稱“上圖”）、《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簡稱“上博”）、《浙藏敦煌文獻》（簡稱“浙敦”）、《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簡稱“津藝”）、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簡稱“北”）、《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簡稱“北大”）、《大谷大學所藏敦煌古寫經》（簡稱“大谷”）、《甘肅藏敦煌文獻》（簡稱“甘藏”）。其中“伯”指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卷子伯希和（P. Pelliot）編號，“斯”指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藏敦煌卷子斯坦因（M. A. Stein）編號，“俄 Дх.”則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藏敦煌卷子編號，而“俄 ф.”為俄藏敦煌文獻中的弗魯格編號。“北敦”指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所用編號。《甘肅藏敦煌文獻》中“敦研”指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獻，“甘圖”指

甘肅省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甘博”指甘肅省博物館藏敦煌文獻，“敦博”指敦煌博物院藏敦煌文獻，“酒博”指酒泉博物館藏敦煌文獻，“永博”指永登縣博物館藏敦煌文獻，“定博”指定西縣博物館藏敦煌文獻，“高博”指高台縣博物館藏敦煌文獻，“渝博”指重慶博物館藏敦煌文獻，“魯博”指山東省博物館藏敦煌文獻，“西北師大”指西北師範大學所藏敦煌文獻。

三、引錄敦煌文獻時，缺字用“□”號表示，缺幾字用幾個“□”。缺字據上下文文意或異本補出時在缺字標記後用圓括號注明。首殘且字數不詳的用“□”表示，尾殘且不清所缺字數的用“□”表示，中殘且字數不詳的用“□”表示。如原卷本身有脫字，則加“[□]”號表示之。脫字據上下文或文意補出時外加“[]”號。文中引用前人整理過的敦煌文獻，其中校錄符號與此有異者，也一律依原卷實際情況改用上揭符號。原卷或所整理文獻文字疑有訛誤而又沒有確鑿證據的用“(?)”表出之；疑作某字的於括弧內注明並加問號，如“人(人?)”即表明該“人”字疑當為“人”字之訛。假借字、訛字在原字後用“()”注出本字或正字。

四、引用敦煌文獻資料標明卷號，若為正面文書，則徑以卷號表示；若為背面文書，則以卷號加英文字母V(Verso)表示。若同一寫卷上抄有不同內容的文書，則在卷號後注明其在卷中次序。如：伯3919A/2《佛說父母恩重經》(10-4)，“A/”後的“2”，表明此佛經在該卷號中居於A部分第“2”的次序；“(10-4)”則說明此經內容計10頁，引文部分在第4頁。引用其他文獻資料在引文後用方括弧標注頁碼、六角方括弧〔 〕標注文獻序號，以便稽核。如：“‘不請’有‘不必’義，《佛經詞語匯釋》已發之。”^{[頁32][3]}表明該詞的考釋在徵引文獻的第32頁，徵引序號為“3”。

五、文中所考釋的字、詞，所引例文中皆以下劃線加以凸顯。

六、《大正新修大藏經》簡稱《大正藏》。T/n/p/abc分別表示所引佛經資料在《大正藏》中的冊數(T)、編號(n)、頁碼(p)和每頁的上中下三欄(abc)，於引文後以上標形式注出。如^[T11n310p560c13]即表明該引文在

《大正藏》第11冊第310號第560頁下欄第13行。其底本主要為高麗海印寺本，簡稱“麗”。校勘別本主要有：南宋思溪藏（簡稱“宋”）、元大普甯寺藏（簡稱“元”）、明嘉興藏（簡稱“明”）、麗本別刷（簡稱“麗乙”）、正藏院聖語藏本（簡稱“聖”）、正藏院聖語藏本別寫（簡稱“聖乙”）、宮內省圖書寮本（簡稱“宮”）、大德寺本（簡稱“德”）、萬德寺本（簡稱“萬”）、石山寺本（簡稱“石”）、知恩院本（簡稱“知”）、醍醐寺本（簡稱“醍”）、仁和寺本（簡稱“和”）、東大寺本（簡稱“東”）、久原文庫本（簡稱“久”）等。“X”為新增經文《已新纂大日本續藏經》（已新纂續藏）所在冊數，如^[X78n1553p420a4-5]表示《已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78冊第1553號420頁上欄第4—5行。

七、為行文簡潔，文中常用書名使用簡稱，如《漢語大詞典》簡稱作《大詞典》，《漢語大字典》簡稱作《大字典》。徵引同一文獻，除首次外，以後引文僅標注頁碼，不再出注著者、書名及出版時間。文中稱引前賢時彥之說，皆直書其名，不贅“先生”字樣，尚請諒解。

八、基於本文所研究對象的特點，為保持所徵引佛經文獻原貌，本書用繁體排版；引文中除與本書說明內容相關的俗字別體，其餘均改作通行的繁體。

緒 論

在敦煌藏經洞出土的近60 000號遺書中，佛經及與佛教相關文獻占95%左右，時間跨度長達六個世紀，是我們研究中古、近代漢語的最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漢譯佛經的語言研究要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所考查的佛典語料的真實、準確是非常關鍵的。董乃斌曾指出：“豐富翔實的資料和在此基礎上作出的嚴密細緻的論析，從來就是學術論著價值的保證。在這裏，資料的可靠與充分無疑是首要的，沒有這個前提，任何高論只是無根之遊談。”^{〔1〕}傳世大藏經，雖然在近千年的流傳中經過多次校訂整理，依然存在不少問題。朱慶之曾說：“如果與儒家傳世典籍相比，漢譯佛典語料在許多方面都是‘含混不清’的。例如年代和譯人，古代經錄許多的錯誤今天仍在沿用；佛典的不同版本之間存在的大量異文也沒有得到認真的研究。這意味著迄今為止對佛典的語言學利用基本上沒有建立在必要的文獻學研究基礎之上。這是相當危險的，必須引起高度的重視。”^{〔2〕}而敦煌佛經中所存與傳世佛典相同的部分，由於傳抄時代距離譯經時代較近，

〔1〕 董乃斌《出土文獻和學術方略》，《文藝研究》2001年第3期。

〔2〕 朱慶之《佛教混合漢語初論》，《語言學論叢》第二十四輯，商務印書館2001年。

有不少在譯出後不久就抄寫流傳到敦煌，因而比後世刻本更接近佛典原貌。在傳抄翻刻過程中，又產生了不少異文，尤其是各種寫經題記，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思想感情、社會生活、宗教活動、風俗習慣、職官制度以及史事等，這些異文題記對校勘和整理漢譯佛經及在此基礎上進行詞匯考釋均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就詞匯研究而言，從理論上講，漢語詞匯史的構建必當是建立在所有傳世文獻的考察研究基礎之上才能稱得上是完整、系統的。敦煌佛典中的古佚經，包括有關禪籍、三階教經典、北朝系統的佛經注疏、中唐以後新譯的經論和編纂的經疏、吐蕃時期在敦煌的高僧曇曠和法成的譯著等。敦煌佛典中的疑偽經部分大多是為了迎合民眾的需要而產生的，依循了漢民族固有的思維方式、文化傳承和風俗習慣，適應了民間社會普通百姓的需求，生活氣息濃鬱，保存了大量的口語詞；不僅如此，大多數疑偽經同時兼具佚典的語料特質。因此，對於中古、近代漢語的研究而言，敦煌佛典中的古佚、疑偽經大多是全新的語料，具有填補空白的研究價值。加強這部分佛典中的語詞的考察和研究，對於構建完整的、系統的漢語詞匯史體系具有重大的意義。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從一開始就是非官方的，是從民間的傳播開始並形成主流的。因此，佛典在中國，在書寫形式上，從一開始就並不遵守以儒家經典用字為規範的正宗，由此而使用了大量的俗字。同時，由於佛教在中國流行面極為廣泛，並逐漸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甚至成為核心中的重要部分，故佛典的流行，又反過來加強了俗字的傳播。敦煌佛經的用字便鮮明地體現了這一特色。由於這些佛教典籍的作者和傳抄者，主要是普通的僧侶、低級官吏和其他勞動者，在撰、抄過程中所使用的多是當時民間流行的通俗字體。在數量龐大的敦煌佛經中，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魏晉直至唐五代宋初俗字的原始風貌，俗字形態豐富多樣，造字理據各具特點，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當時文字的使用狀況。對敦煌佛經中的俗字加以考察，瞭解其使用的特定年代和地域特點，對於推進近代漢字研究的不斷深入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為此，本書選取敦煌佛經特別是其中的古佚、疑偽經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書稿分上、下編，上編主要介紹敦煌佛經，重點選取了古佚經111篇、疑偽經68篇加以介紹，簡要回顧了敦煌古佚、疑偽經研究狀況，分析了敦煌佛經語料的研究價值，初步探討了本課題（敦煌佛經語詞和俗字研究）對於佛教典籍的校勘與整理，對於字典辭書的編纂與完善，對於構建完整、系統的漢語詞匯史，推進近代漢字研究的不斷深入所具有的重大意義；下編主要嘗試對其中的210個語詞、78個俗字進行了考釋。